



譚嗣同的佛學思想

……計其精微，不善若，或長龍大苦業，皆發業主，或長，
不苦不樂，皆於此受業，受業，受和，受患，受讓，不誠實，
期離主，三事味合，緣離，離主受，苦若，苦業，

不受發音，入於惡業，未發離離。
南，離離，離離。以得離離出主日盡，其行日立，以得離離，
唯長亦，長亦，長亦。以得離離出主日盡，其行日立，以得離離，
以得離離出主日盡，其行日立，以得離離，

……計其精微，不善若，或長龍大苦業，皆發業主，或長，
不苦不樂，皆於此受業，受業，受和，受患，受讓，不誠實，
期離主，三事味合，緣離，離主受，苦若，苦業，

……計其精微，不善若，或長龍大苦業，皆發業主，或長，
不苦不樂，皆於此受業，受業，受和，受患，受讓，不誠實，
期離主，三事味合，緣離，離主受，苦若，苦業，

三書，思對引到派茲：

蔡惠明

譚嗣同（一八六五—一八九八）字復生，號壯飛，湖南瀏陽人。他是戊戌變法維新派的重要人物，同時也是一個「暢演」佛教「宗風」，崇信佛學的學者。

譚嗣同暢演宗風，敷陳大義，斯事體大，未敢率爾，且亦不暇也。近始操觚爲之，孤心萬端，觸事紛出，非精探性天之原，不能寫出此數千年之禍象，與今日宜掃薄桎梏，衝決網羅之故，便覺刺刺不能體，已得數十篇矣。可見他寫「仁學」的目的，既是爲了宣揚佛學，又是爲維新運動提供理論依據。

譚嗣同幼年穎慧過人，「五歲受書，十五學詩，二十學文。」（「三十自紀」）。勤奮好學，博覽羣書。在甲午戰爭後，悉棄舊學，主張變法維新。一八九六年北游訪學後，又轉向佛學，「盡晝夜精治佛咒」，研究佛教哲理。梁啟超在「譚嗣同傳」中稱他：「聞華嚴性海之說，而悟世界無量，現身無量，無人無我，無去無住，無垢無淨，捨救人外更無他事之理。聞相宗識浪之說，而悟象生根器無量，故說法無量，種種圓性無礙之理，則益大服。自是豁然貫通，能滙萬法爲一，能行一法爲萬，無所掛礙，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。」

在「仁學」中，譚嗣同寫道：
「佛法之大，固無所不包涵也。教能包括專門之學，而各專門之學不能包括教。……蓋教能包政學，而政學不能包教。教能包無教，而無教不能包教。……佛能統孔耶。六經未有不與佛經合。西學皆源於佛學。」

譚嗣同提倡佛學，崇信佛教，並非求個人成佛，而是想以佛學思想爲武器，從中吸取力量，奮發有爲，改造社會。他創作「仁學」，據他自稱，是受他的佛學導師吳雁舟的囑托，爲的是一暢演佛教宗風，敷陳變法之義。「譚嗣同全集」載：「去年吳雁舟到金陵，述卓如兄言，有韓無首大善知識，將爲香港『民報』

「佛教純者極純，廣者極廣，不可爲典要。惟教所適，極地球上所有羣教羣經，諸子百家，虛如名理，實如格致，以及希夷不可聞見，爲人思力所僅能到，乃至思力所必不到，無不異量而

兼容，殊條而共貫。今將籠象教而合之，……斯教之大權，必終授諸佛教。」

譚嗣同又認爲：世界的起源，只有佛才能解釋清楚，他宣稱：「無明起處，唯佛能知。」「佛教能治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之地球星球，盡虛空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之微塵世界。盡虛空界，何況此區區之一地球，故言佛教，則地球之教可合而爲一。」（均見「仁學」）

譚嗣同的佛學思想形成了一個體系，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：

（一）發揚華嚴的「相對」論點：華嚴宗提出「一多相容」和「三世一時」的相對論點，認爲任何事物都是相對的。如「華嚴金師子章」云：「一全是多，方名爲一；又多全是一，方名爲多。多外無別一，明知是多中一；一外無別多，明知是一中多。」又云：「念念生滅，剎那之間，分爲三際，謂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。」這是說，一和多是相對的，時間概念也是相對的，一念之中就可包括「三世」。譚嗣同在「仁學」中接受了這一論點，認爲是「天地萬物自然而然的真理。」他寫道：

「今天我何以知有今日也？比於過去未來而知之。然而去者則已去，來者又未來，又何以知有今日？迨乎我知有今日，則固已逝之今日也。過去獨無今日乎？乃謂之曰過去。未來獨無今日乎？乃謂之曰未來。今日宜爲今日矣，乃閱明日，則不謂今日爲今日，閱又明日，又不謂明日爲今日。庸詎知千萬年之今日，非今日之今日，庸詎知千萬年後之今日，非今日之今日？佛故名曰：『三世一時』。」

他接着發揮說：

「吾謂今日者即無今日也。皆自其生滅不息之言也。不息故久，久而不息。則暫者綿之永，短者引之長，渙者統之萃，絕者續之互，有數者渾之而無數。有迹者溝之而無迹，有間者強之而無間，有等級者通之而無等級。」關於空間，他寫道：「體貌顏色，日日代變，晨起而觀，人無一日同也。骨肉之親，聚處數十

年，不覺其異，然回憶數十年前之情景，宛若兩人也。則日日生死，實日日死也。天曰生生，性曰存存，繼續承承，運以不停，孰不欲攀援而從之哉？而勢終處於不及。」因此，他認爲：「天不新，何以生？地不新，何以行？日月不新，何以光明？四時不斷，經絡者絕矣；以太不新，三界萬法皆滅矣。」他又引證了佛經「一剎那頃，已有無量佛生滅，已有無量衆生滅，已有無量世界法界生滅」的原理，爲維新變法找依據。

二，繼承佛教的平等觀念：在「仁學」中，譚嗣同指出：「印度自喀私德之名立，分人爲四等，上者世爲君卿大夫士，下等世爲賤庶奴虜，至不平等矣。……佛出而變之，世法則曰平等，出世法則愈出天之上矣，此佛之變教也。」當時印度社會，有嚴格的種姓制度，一般稱爲四種姓，就是婆羅門，刹帝利，吠舍和首陀羅。前二種爲統治階級，第三種姓包括工、農、商，首陀羅則是所謂賤民。這四種種姓，等級森嚴，極不平等。佛教則反對這種制度。譚嗣同說：「其在佛教，則盡率其君若臣與夫父母妻子兄弟眷屬天親，一一出家受戒，會於法會，是又普化彼四倫者，同爲朋友矣。無所謂國，若一國。無所謂家，若一家。無所謂身，若一身。」又說：「大同之治，不獨父其父，不獨子其子；父子平等，更有有於君臣？舉凡獨夫民賊，所爲一切箝制束縛之名，皆無得而加諸，而佛遂以獨高於羣教之上。」

他遠極力提倡男女平等。「仁學」中，他寫道：「男女同爲天下之菁英，同有無量之盛德大業。……佛書雖有『女轉男身』之說，惟小乘法耳。若夫『華嚴』，『維摩詰』諸大經，女身自女身，無取乎轉，自絕無重男輕女之意也。」

三，吸取佛學中的「無我」思想：印度大乘佛學空宗有「我法兩空」的理論，中國唯識宗繼承了這一思想，提出了「三界唯心」「萬物唯識」的理論。「成唯識論」載：「有假說我，法，有種種相轉，彼依識所變。」譚嗣同吸取了佛學中的「無我」思想，主張建立「不爲自己求安樂，但願衆生得離苦」的高尚人生觀，具有奮不顧身的自我犧牲精神。

他在「仁學」中說：「好生而惡死也，可謂大惑不解者矣！蓋於『不生不滅』懵焉。知身爲不死之物，雖殺之亦不死，則成仁取義，必無恐怖於其衷。……是故學者當知身爲不死之物，然後好生惡死之惑可祛也。」他提出：「救人之外無事功，卽度衆生之佛法。」在「與唐繼丞書」中，他寫道：

「怨天尤人，具以救世之心，未嘗迫切，心乎救世焉，知有我哉？佛門之局量，勇猛無畏最大，然不能徑致也，必慈悲爲之根。慈悲則德幾全矣。益無以致？必植基於平等；欲平等，必化異同，必無我相。」當變法失敗，明知必死，他並不逃避，「竟日不出門，坐以待捕，」最後英勇犧牲，說明是實踐佛教，「無我」，「捨己利人」的教義的。

四，提倡佛教「勇猛無畏」的精神：譚嗣同於「仁學」中說：「佛一名『大無畏』。其度人也，曰『施無畏』。無畏有五，曰：無死畏，無惡名畏，無不活畏，無惡道畏，乃至大眾威德畏。」他認爲：「佛教的精髓就是威力、奮迅、勇猛、大無畏。善學佛者，未有不震動奮厲而強剛猛者也。」正是爲了發揚佛陀大無畏精神，他勇敢地高呼衝缺一切封建網羅的口號：「初當衝決利祿之網羅，次衝決俗學若考據、若詞章之網羅，次衝決全球羣學之網羅，次衝決君主之網羅，次衝決倫常之網羅，次衝決天之網羅，次衝決全球羣教之網羅，終將衝決佛法之網羅。」正是這種豪邁之氣概，使他能視死如歸，毫不畏懼，在臨刑前還喊出：「有心殺賊，無力回天，死得其所，快哉快哉！」的心音。梁啟超在「譚嗣同傳」中引述譚自己的話說：「各國變法，無不流血而成，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？此國之不昌也。有之，請自嗣同始。」可見佛學思想中的大無畏精神，在他身上不僅具體體現，而且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如上所述，譚嗣同所作的「仁學」，雖然章太炎「怪其雜揉」，要其以唯識「微生滅」（量變）的思想，作爲理論根據，並強調「意識斷則我相除；我相除則異同泯；異同泯則平等出；至

於平等，則洞徹彼此，一塵不隔，爲通人我之極致。」

但就其總體而言，自始至終貫穿了佛教思想。華嚴的菩薩行，與誓不成佛之旨在這部著述中發揮得淋漓盡致。宋平子贈詩有句云：「神交昔下千行淚，心應今傳萬字書。」對「仁學」確是推崇備至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：譚嗣同在研究佛學中，還接受了佛教「三世因果，六道輪迴」的學說。在「仁學」中，談到「彼岸世界」與「靈魂」時，他說：「今使靈魂之說明，雖至黯者猶知死後莫大之事，及無窮之苦樂，必不於生前之暫苦暫樂而生貪著厭離之想。知天堂地獄，森列於心目，必不敢欺飾放縱，將日遷善以自兢惕。」其實，佛學沒有用「靈魂」這一名詞，佛教認爲生命是由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五蘊構成的。色是物質；受、想、行、識屬於精神。心色二法，各不相同，互有聯繫，並有主次。作爲一個有情，必須具足心、色二法，缺一不可，由精神攝持物質，令不散失；由物質滋養精神，令得安住。在一期生命終了時，肉體和精神的依存關係破裂。肉體部份離開了精神的攝持，按物質的能量不滅的定律，分化瓦解，各奔前程，而精神部份則隨業流轉，繼續馳驅，就是四有輪轉，如「修引道地經」說：「神離人身，住於中止（中陰），五陰悉具，無所乏少。死時五陰，不到中止，中止五陰，亦不離本也。譬如印章，以用印泥，印不着泥，亦不離之。」在這方面，顯然譚嗣同的研究還不夠深入。

總的說來，譚嗣同從一八九六年北游訪學開始研究佛學，至一八九八年罹難，時間僅及三年。能如此融會貫通，深入淺出地應用實踐，確是難能可貴的。他在奉詔進京時寫信給妻子李閏說：「我此行真出人意外，絕處逢生，皆平日虔修之力，故得我佛慈悲也。」說明他平日也能用功虔修，只是由於業力支配，把希望寄托在「自身難保」的光緒皇帝身上，而歸於失敗，落得「定業難逃」，這也是無可非議的。我們相信，他已種諸善根，在未

（完）